

桂子山·珊瑚泉

——外国文学两地观

邵旭东◎著

桂子山，华中师范大学，作者文学研究和文史翻译的起点
珊瑚泉，美国迈阿密小城，作者人生旅途的物质依托

只要你喝过『华师』的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
你都永远是桂子山人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

桂子山·珊瑚泉

——外国文学两地观

邵旭东 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桂子山·珊瑚泉：外国文学两地观：中文、英文 /
邵旭东著. —北京：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16.8

ISBN 978-7-5139-1211-2

I. ①桂… II. ①邵… III. ①外国文学—文学评论—
文集—汉、英 IV. ①I1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3048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16

桂子山·珊瑚泉：外国文学两地观

GUIZISHAN · SHANHUQUAN: WAIGUO WENXUE LIANGDIGUAN

出 版 人	许久文
著 者	邵旭东
责任编辑	郭长岭
特约编辑	汤万星
封面设计	九章文化·陈桂莲
出版发行	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	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	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
邮 编	100102
印 刷	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7.5
字 数	238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139-1211-2
定 价	38.00元

注：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自序

过去的50多年中，我在美国居住了20年（访学两年，回访后定居18年）。我在中、美两国的生活，都是定居，又都是漂泊。现在除了我的出生地内蒙古包头可以作为我人生的起点，我的老家河北正定可能成为我人生的终点之外，国内外各地，都成了我求学漂泊的驿站。

有两个驿站值得在此一记：一个是桂子山，一个是珊瑚泉。桂子山在湖北武汉，华中师范大学的所在地，她是我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史翻译的起点站；珊瑚泉（Coral Springs）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西北边，一个16万人的小城，是我的主业和副业得以发展的物质依托。

一个驿站为我撑起了学灯，一个驿站为我安排了桌椅；一个照耀了我的成长，一个见证了我的努力。我的笔耕历程，大多漫步在两个驿站之间。这本集子里的文字，就是我在两所驿站留下的足迹。

我怀着深切的感恩之情打造着这本散论集。“感恩篇”里的《恩师风范伴我行》，表达了我对桂子山的感激和思恋；“论述篇”和“评传篇”中的大部分文字，都是在桂子山孕育和诞生的；论集中提到的《南希与里根》（译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同样出自于母校桂子山。我到美国后，教过书、打过工、求过学、改过行，但读书、写作永远伴随着始终，而且基本上没有

离开珊瑚泉。我的 110 万字的译著《美国史》(海南出版社,2009 年、2014 年),每个汉字和标点符号都出自珊瑚泉的金湾住宅;“论述篇”和“翻译篇”中除了莎士比亚的那篇论文(成于桂子山)外,所有的出产都是我在珊瑚泉住宅的车库吸烟时打好了腹稿,回到书房再一气呵成的。“英文篇”中的所有文字,着实也无法摆脱与桂子山、珊瑚泉之间的联系。

自然,人不能忘本:让我最终吃饱肚子的是第二个或第三个馒头,但我不能忘了垫底的还是第一个馒头。其实我的第一个“馒头”在内蒙古呼和浩特(见“感恩篇”第三章),那也是一个驿站。没有它,我无法起步和前行。

人上了年纪以后更懂得感恩,也逐渐开始怀旧——去想想人生的驿站,去追寻那些几近消失的足迹。这是本书的隐含动力(impetus)之一。足迹的连接有保存“历史原貌”的痕迹,但本书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文字从未在国内纸质媒体发表;英文发表的文字在国内的阅读量绝对不超过五人——大概几亿分之一吧。

驿站间的足迹走得正不正,我恳请亲爱的读者来评判。

再次献上感激的心。

邵旭东

2015 年 7 月 27 日北京海淀冬晴园寓所

自序 / 001

感恩篇

003 / 恩师风范伴我行

012 / “故园三十二年前”:《外国文学研究》

022 / 外国文学的启蒙师

论述篇

029 / 美国小说中的荒诞问题

046 / 同源而殊途 殊途而同归

——三大戏剧体系概述与比较

063 / 论左拉的《卢贡家族的发迹》

074 / 何以写出《呼啸山庄》

——也谈艾米丽·勃朗特的创作源泉问题

084 / 斯坦贝克笔下的“流动”家族

093 / 莎士比亚长诗《鲁克丽丝受辱记》

103 / 文贵精短意贵深

107 / 美国的文学研究: 20 世纪 90 年代拾零

117 / 风萧萧兮易水“潺”

——《月儿》散论

133 / “北美大牛”的《五尺鱼》

评传篇

141 / “变调的行吟者” 瓦尔特·惠特曼

152 / “乡下人” 福克纳

附：威廉·福克纳故乡访问记

176 / 风骨魁奇的怪杰

——爱伦·坡

189 / 为黑人辩护的首席律师

——詹姆斯·鲍德温

201 / “军规”制下的约瑟夫·海勒

翻译篇

219 / 布林克利著《美国史》中译本前言

221 / 《美国史》译后记

224 / 《美国史》翻译花絮：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林克利教授

227 / 《这就是美国史》前言、后记

232 / 《坏人的美国史》（节选）

236 / 《二战史》译后记

英文篇

241 / A STONE FROM ANOTHER MOUNTAIN: THE CHINESE
RECEPTION OF WILLIAM FAULKNER

（他山之石：国内上世纪的福克纳研究）

255 / US Media Interview: China Poetry

（美媒访谈：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社会、文化与诗歌）

269 / 跋

271 / 后记

恩师风范伴我行

感恩篇

恩师风范伴我行

我有幸成为王忠祥老师的学生，完全是因为导师的一个“非政治正确性”的决定。其中的故事当年不便多讲，因而至今还算是鲜为人知。

1982年春天，我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四年级。我从当时学校仅有的一份“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表”中看到了武汉华中师院的王忠祥老师要招收两名外国文学研究生，方向是西欧文学。我自觉专业理想，便填写了报名表，并如期参加了考试。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年全国报考王老师的学生竟有67人，我的考试分数在所有考生中仅名列第三。不过在懵懵懂懂、焦急等待近三个月时，我终于在草原青城的内蒙师院等到了一个厚重的信封（薄信必定是一页落选通知）——我被导师和华师录取了！

我非常幸运，但并不是导师扩招之后才收了我这个第三名。我到华师报到后知道，导师只招了师姐张唯和我两个人。张唯是华师英语系应届高才生，所有考生中总分第一，必定录取无疑。那总分第二名呢？为什么没招？原来导师不仅看总分，而且看专业和外语成绩。据说第二名政治分高，英语分低；而我是英语分较高，政治不及格。第二名应该不知自己是第二，但他从外省托人找到了当时的校领导询问。导师的回答是，他要招专业和外语都好的人，政治分高没用。几方面的人（包括校研究生处）都想影响导师的决定，导师急了：“我这儿是外国文学专业，不是政治系。”于是，导师把校领导的面子给驳了，大概也把政治系给得罪了。但我却对此一无所知。1982年8月26日，我揣着自

认为当之无愧的录取通知，千里跋涉之后投在了导师的门下。

从踏上桂子山之日起，我的生活和求学道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正是这种改变，奠定了我日后跻身学术研究甚或科技攻关领域的基础；正是这种改变，培植了一种30年来让我始终尽享导师风范和恩泽的师生友情；正是这种改变，孕育了我此生精神生活中那种可持续动力元素——文学情结和翻译情结……这些均为后话，下文再叙。

导师的门下学风严谨。开学后不久，我便为扑面而来的众多高深理论所震慑。首先是旁听导师的第一届（79级）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。师兄师姐们的论题和讲述把我带入了云中雾里，实在不知道他们如何将莎士比亚（鲁荫）、哈代（聂珍钊）和狄更斯（郭珊宝）研究到如此精深的程度；他们的观点和论证我都没听过，也很难听懂。还有关于屠格涅夫（朱宪生）、布洛克（于胜民）等论题，更是让我觉得陌生。我不禁担心自己的文学潜力：三年后要我学成他们这样，是不是太难了？

第二个震撼是阅读书目。导师要求头两年应该完成的书目包括哲学、美学、文学理论、文学史书、欧美名作、当代研究等各类，其中不乏尚未翻译的英文原版。我上大学时偏爱外国文学，自认读了不少作品，但相比这份书单而言，仍然是沧海一粟。我曾大略估算，若完成这份书单，需要每三天读一本（需要重读的书尚未计算在内）。压力之下的“计策”，只好是重点优先，也就是选择导师要讲、要查的先读，其余排后。不过这样下来，居然真的读了许多书，最后可能超过了书单——因为第三年论文选题和写作期间的所读、所译，都算是书单指导下的额外收获。

第三个震撼就是以学位为目标的三年规划。导师说了，第一年的“公共课”（政治、二外）要学好，美学原理和俄苏、东方文学的课也不能缺。第二年将专注于欧美文学专题、原著研读和翻译训练。最后一年就是讲课实习、开题报

告和毕业论文（含答辩）。我内心又在紧张，其实第三年才是最要劲的时候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

当初觉得若不想让导师失望，就只有熬夜——熬夜当然意味着“用功”，不想早晨睡懒觉被导师抓到。30年前没有手机和电脑，导师经常亲自到研究生宿舍通知授课时间或变化，所以很容易抓到我睡觉。我解释说，我是“熬夜了”，所以……导师半开玩笑地说：熬夜是要把当天没做完的事补上，不是把睡觉移到第二天。“我也熬夜，但我第二天照常起床，这样熬夜才算值得”。咳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竟在彼时才突然悟到：熬夜不等于晚起，熬夜不等于用功，熬夜只等于当天少睡。

导师本人的勤奋和刻苦是有名的。我到华师的第一年，导师仍住在一间13.8平方米的宿舍。作家李华章当年看到的大概就是这间小屋^[1]；导师让师母贺秋芙教授将自己反锁在内（避免干扰）的房间包括这间小屋；朱、聂师兄和我留校后居住的，也是桂子山上同样的、号称“老招待所”宿舍的另一间小屋。但就是在这样的小屋（是否联想到巴尔扎克写作的陋室？），我的导师创作了他学术生涯前30年多达百万字的学术成果。当我在这间小屋拜见导师的时候，他却觉得生活艰苦没什么关系。他还谦虚地说：“我不是那种绝顶聪明的人，我的成果全靠‘笨鸟先飞’和刻苦勤奋；我不相信仅凭天分和灵感就能够取得成就。”导师痛恶浮躁张扬、好大喜功，深爱清贫简朴、脚踏实地。

导师常被师母反锁房内，为的是逃离干扰，但政治运动的冲击并不是躲在陋室中就能避免的。导师投身的学术领域，在历次运动中首当其冲，这使他不幸历经了“右倾”的嫌疑。在“文革”的大字报中，导师甚至被定性为“白专”……这一切使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即申请入党的专家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未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（他人的妒忌与制衡心理，不值得笔墨再及）。导

[1] 见《中国作家》1991年第5期，第209~210页。

师说：“我经历过多次冲击，但执着于学问和真理最为重要，否则没法搞外国文学……”

1983年2月9日，春节前，由张唯集句，由我涂鸦并自裱了一幅“书法”送给导师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（范仲淹语）我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内心情感，即对导师学问的敬重，对导师风范的景仰。

我不是先生的杰出弟子，却深蒙老人家关爱。这里另有毕业前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。1985年3月的某个傍晚，我大学母校中文系的主任和书记（马兴业、杨效春）竟在千里之外的华师二号宿舍楼找到了我。我受宠若惊，不知所措。见面的细节均已忘记，但他们的来意依然清晰：你的导师不愿意放你——我们也是顺便，看看你的意思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，今后的去向，我愿遵从导师的意见。我未能请母校的老师多留，因为我当时的全部心思，都在猜测和感怀我的导师究竟如何拒绝了母校老师们的请求。

就这样，我毕业后留在了导师的身边。我属外国文学教研室（主任彭端智教授）兼《外国文学研究》杂志（导师是1978年的创始人之一，徐迟之后的第一任主编）的编辑。那些年间，我与导师事业与共，但仍非导师的教导与提携而不能。

初为大学教师，我感到压力实在不小。教学上一定要“顶呱呱”（导师语），科研上要担项目、出成果，编辑、翻译、行政工作也都要合理兼顾。导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邵啊，你现在必须学会‘弹钢琴’——只有十个手指都会动，才能做到一专多能。”其实在“多指弹琴”这方面，先生是近在咫尺的典范。他除了当杂志主编、带研究生之外，还给本科生、函授生、（中央）电大生授课；除了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，还要负责省级的研究课题；除了任全国社科规划组成员（1986~2003），还要主持湖北外国文学学会的工作……在导师的学术殿堂，不知有多少枚并行排列的琴键等待他同时弹响。我曾想，就算我全身心地遵从



本书作者（右）与导师王忠祥教授（中）及师母贺秋英合影

和效仿，也很难真正顾及整体。

我要弹好讲课的“琴”。导师（和主任）的教导是合理协调“点”与“面”的关系（即英美文学与欧洲文学）。老师们说，要首先把全部欧洲文学史“讲通”，然后才能专注于西欧或国别文学。所以我最初登台讲授的课程，并不是专业方向上的西欧文学，而是“俄苏文学”。在我“讲通”了整个欧洲文学（近两年）以后，导师才开始指导我开设专题课，讲西方现代派、外国家族小说，并允许我（1990年访学归国之后）给他的研究生班讲授“当代美国文学”。我从学生时代就领略到，导师的授课风格是不靠讲义、出口成章、娓娓动听、面带微笑。我当然一直在极力模仿，但导师的一种风格我始终都没学会，那就是授课时能够面带微笑。我不能像导师那样对授课内容烂熟于心，脸上的肌肉自然不能收放自如。

导师继续指导我确立科研方向和专业选题。导师说，我应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，由此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领域。我深有感悟，提出以高尔斯华绥小说创作类型为基础的“西方家族小说”的研究课题。导师非常赞同，并进而阐述了这一课题的可持续前景：诺贝尔奖作家系列，中西

家族小说比较，小说类型与叙事理论……在导师的鼓励下，我更加专注于家族小说研究，并希望能够按他老人家的希冀，以此课题申请国家社科（青年）基金项目。

导师是国家社科规划组成员（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比“博导”更高的学术头衔），审批过无数的国家项目。他从北京回来后和我说，专家们认为，你的选题范围太广，外文基础不够。你虽赴美访学，但你的外语仅限于英语，课题中其他语种的作品和研究你怎么读？我深感自己在学术视野上的差距，后按导师的建议，将课题修改为“英美家族小说研究”并重新论证。第二年，我的项目申报更得导师力荐，课题终于通过了专家组的评审。

此次经历更使我体会到导师所说之外文和翻译的重要。早在学生时代，导师就给我们开翻译训练课（没想到，后来的资料翻译竟成为我毕业论文之必需）。工作后，导师更要求教学、科研和翻译并重，强调外文能力和开窗纳入“域外清风”（高尔斯华绥语）。我对导师 20 世纪 70 年代即参与《挪威简史》等著作翻译崇拜有加，后又亲见《易卜生在挪威与中国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易卜生文集》）等重头译作的出版，我便暗下决心，矢志效法。过去十几年间，我之所以一直纠缠于文史翻译情结，大都是受导师研、译并重思想的影响。要知道，他老人家在 70 多岁之高龄仍不断出版全新译作。

回想我在导师身边的岁月，实在感念良多。我始终亲得先生的“真传”和眷顾（包括晋升副高职），但我却未能及时修成“正果”。后来的年代里，我又到了国外，“风也过，雨也走，有过泪，有过错”，但我仍记得感激什么——那就是先生（也是当今莎士比亚专家、易卜生专家、文史家和翻译家）的人格风范，另有他老人家多年来对我的叮嘱和挂念。

1988 年我到美国孟菲斯大学做访问学者。导师的教导是：利用国外资源，深化研究领域。我去到孟大的外语系教课，并在英文系进修课程。

此时导师仍不忘及时提醒：争取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成果，以便回国继续发展。多亏恩师的信函指导，才使我这次访学不虚此行。1990年我重登桂子山之时，带回了学位成绩，国外发表的论文，还有重达200多磅的英文书籍。

这里顺便提一下我的美国导师（所谓“疾学在于尊师”），但只想作个客观比较。美国导师友好（我是“外国朋友”），但能交心时刻较少；美国导师可以“言传”，但未必时刻“身教”（生活方式不同）；美国导师独具专长，然“诲人”的风范模糊。这可能与人们常说的“缘分”有关，或许亦是中、美文化差异在“教书育人”领域的体现？

在国外凡有事业转折或争取机遇，我都要麻烦导师推荐（难忘三封由先生亲自签名并盖有红色印章的英文推荐信）。我二次赴美后再读学位，虽更换了主攻方向，但仍蒙导师的举荐和支持。由此我也感到，虽有专业的转换，但并未偏离导师事业和风范的伴随。1996年，我的新学位即将完成，但文学兴趣依然不减，业余时间将“家族小说”的后续课题和国外英美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写成文章，寄给导师，算是我交给先生的“函授”作业。在美定居后，我逐渐将业余时间集中于文史翻译，除偶成一两篇文论外，译作均边缘于外国文学，于是便不再敢轻易地寄给恩师看了（顾虑到当年未能将“驻留观望”的选择尽早告知他老人家，内心也常觉歉疚）。

恩师桃李天下，其风范所及远非我一人。老人家门下共有八届博、硕弟子，在国内的，多数已是名校的教授和博导，在教学、科研、编辑、翻译领域尽展其才；在美国和澳洲的，很多也是文学、哲学、美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；更有人跻身商业管理和信息科技，成为跨学科领域的人才。我和国内外师兄弟姐妹们偶有联络，但凡交谈，无不念及华师时代和导师恩德。2001年恩师70华诞后，海外弟子们先后收到了庆典活动的照片。当时我们纷纷设想，在先生80寿辰时定要摆脱繁杂事务，一同前往桂子山向导师谢恩、祝寿。

恩师的弟子中有人在毕业后选择了向其他学科发展，这很正常。但必须承认，正是导师门下的三年，为我们日后的任何发展奠定了“可持续发展”的重要基础。可以这样说，只要你曾是导师的弟子，聆听过恩师的教诲，蒙受过先生的恩泽，你的身上就有外国文学的血脉，就有恩师风范的影响——如同你只要喝过华师的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你都永远是桂子山人。

“明师之恩，诚为过于天地，重于父母多矣。”晋代葛洪的这句话用在恩师身上，实在恰如其分。

2008年12月8日，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桂子山，专程看望导师、同学和同事。我已不知先生的住址，于是先到文学院《外国文学研究》杂志社，再从那里给他打电话，也希望能给老人家一个惊喜。

我们从文学院步行到先生在华师北区的家中。走过山坡进入住宅区，忽见道路远方矗立着一位老人的身影。老同事张建新说：“坏了，王老师已经在外边等你。”原来我们在打完电话后又有耽搁，恩师已经在寒冷的北风中站立多时。

恩师动情地握住我的手，久久不放，一直将我从路口领回家中，随后仍是做学问、做翻译、退休后带学生、莎士比亚研究的最新成果、外国文学史的全新范式、生态文学批评等说不完的话题。师母贺教授更是忙前忙后，还去酒窖拿了好酒，坚持请我们出去吃饭。

恩师再领我进到他的书房——四面书柜书架，只留进门之处和对面的大窗。我重生仰慕之情，连拍了几张书房的照片，想待心绪平静后重温此刻所受的安装。

定格在我记忆中的仍是北风中矗立的恩师的侧影，它让我联想，让我感慨，令我醒悟，励我前行。导师的风范，其实就是在桂子山、南湖畔的类似环境中炼成的。他严谨执着的治学之道、惜才重能的育人之风、宽容善意的豁达之情，